

• 读史札记 •

后晋“岁输”浅议

张 金 铎

后唐清泰三年(936年),河东节度使石敬瑭(晋高祖)以称臣称子、割让幽云诸州,取得契丹援助,进而建国称帝。后晋建国后,又向契丹“岁输帛三十万匹”。割让幽云诸州,导致中原门户洞开,北方游牧骑兵可以直入中原腹地。当时人就已看到,“赵、魏之北,燕蓟之南,千里之间,地平如砥,步骑之便,较然可知”(《旧五代史·桑维翰传》,中华书局1976年版,第1165页)。叶隆礼《契丹国志》卷三《太宗嗣圣皇帝纪下》也评论说:“幽燕诸州,盖天造地设以分番、汉之限,诚一夫当关,万夫莫前也。石晋轻以畀之,则关内之地,彼扼其吭,是犹饱虎狼之吻,而欲其不搏且噬,难矣!遂乃控弦鸣镝,径入中原,斩馘华人,肆其穷黩。”(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,第39~40页)两宋军事处于被动局面,尽管有其政治、军事等多种因素,但与“久失地利”也紧密相关(《辽史·兵卫志下》,中华书局1974年版,第433页)。而后晋“岁输”绢帛于契丹,又开两宋“岁币”之先例。关于后晋“岁输”绢帛问题,相关论著多有提及,但都没有展开讨论。本文试就后晋“岁输”起始年代、“岁输”由来及其影响进行分析。

一 “岁输”之起始年代

清泰三年五月,后唐废帝迁河东节度使石敬瑭为天平节度使,遭到拒绝。石敬瑭“上表论废帝不当立,请立许王从益为明宗嗣”(《新五代史·晋高祖纪》,中华书局1976年版,第79页)。六月,后唐撤销石敬瑭本兼各职,以张敬达为太原四面招讨使、杨光远为副使讨伐石敬瑭。石敬瑭求援于契丹,“令桑维翰草表称臣于契丹主,且请以父礼事之。约事捷之日,割卢龙一道及雁门关以北诸州与之”。部将刘知远反对割地,他向石敬瑭建议:“称臣可矣,以父事之太过。厚以金帛赂之,自足致其兵,不必许以土田,恐异日大为中国之患,悔之无及。”(司马光:《资治通鉴》卷二八〇,天福元年七月,中华书局1956年版,第9146页)石敬瑭不从。对求援情况及结果,《旧五代史·晋高祖本纪一》载,张敬达大军围攻太原,高祖“遣心腹何福轻骑求援北蕃(指契丹),蕃主自将诸部赴之,不以绢帛,不以珠金,若响应声”(《旧五代史》,第987~988页)。可见此时尚未涉及“岁输”绢帛之事。

九月,辽太宗耶律德光亲率大军入援,击破后唐张敬达大军。十一月,辽太宗册立石敬瑭为皇帝。《资治通鉴》卷二八〇记载,天福元年(936年)十一月丁酉(十二日),“契丹主作册书,命敬瑭为大晋皇帝,自解衣冠授之,筑坛于柳林,是日,即皇帝位。割幽、蓟、瀛、莫、涿、檀、顺、新、妫、儒、武、云、应、寰、朔、蔚十六州以与契丹,仍许岁输帛三十万匹”(司马光:《资治通鉴》,第9154页)。《五代会要》、《契丹国志》、《旧五代史》等对此记载相同。《旧五代史·契丹传》云,“德光乃自率五万骑,由雁门至晋阳,即日大破敬达之众于城下,寻册晋高祖为大晋皇帝,约为父子之国,割幽州管内及新、武、云、应、朔州之地以赂之。仍每岁许输帛三十万”(《旧五代史》,第1833页)。据此知,石敬瑭受册为帝后,许诺岁献契丹绢帛三十万匹。

然后晋初期政局持续动荡,割地、“岁输”并不顺利。据载,“时晋新得天下,藩镇多未服从,或虽服从,反仄不安”(司马光:《资治通鉴》卷二八一,天福二年正月戊寅,第9168页)。晋高祖刚入洛阳,曹州、镇州、同州、郢州等地先后发生内乱。天福二年(937年)正月,安远军节度使卢文进叛降于吴。六月,天雄节度使范延光据镇反抗,自称天子。晋高祖以杨光远为都部署、张从宾为副领兵进讨。但是张从宾进至河阳时,即举兵响应范延光,杀死晋高祖之子、河阳三城节度使石重信,又至洛阳杀死晋高祖另一子、东都留守石重义,“取内库金帛以给部伍,因东据汜水关”(《旧五代史·张从宾传》,第1289页)。虽然张从宾很快兵败溺死,但范延光之乱延至天福三年九月才告平息。其时晋、辽摩擦不断,不仅有吴、南唐从中挑拨的原因(陆游:《南唐书》卷一八《契丹传》,文渊阁四库全书本),而且后晋官员亦多不服契丹。在被割让的幽云诸州中,应州马军都指挥使郭崇威“耻臣契丹,挺身南归”(司马光:《资治通鉴》卷二八一,天福二年二月戊子,第9169页);云州节度判官吴彦亦据城抗击契丹。契丹使节来到中原,“小不如意,辄来责让,帝常卑辞谢之。晋使者至契丹,契丹骄傲,多不逊语。使者还,以闻,朝野咸以为耻”(司马光:《资治通鉴》卷二八一,天福二年八月辛酉,第9188页)。成德节度使安重荣尤为愤慨,以为“诋中国以尊夷狄,困已敝之民而充无厌之欲,此晋万世耻也”(《新五代

史·安重荣传》，第583页）。凡是契丹使臣过境必遭其谩骂，甚至被执杀。后来，他还与山南东道节度使安从进举兵叛乱。故史称，晋“高祖取天下不顺，常以此惭，藩镇多务，过为姑息。而藩镇之臣，或不自安，或心慕高祖所为，谓举可成事，故在位七年，而反者六起”（《新五代史·安重荣传》，第586页）。

据《辽史·太宗纪上》记载，天显十二年（晋天福二年，937年）六月，“晋遣户部尚书聂延祚等请上尊号，及归雁门以北与幽、蓟之地，仍岁贡帛三十万匹，诏不许”（《辽史》，第41页）。这次晋辽土地交接以及“岁输”并未完成。天福三年（辽会同元年）十一月，“晋复遣赵莹奉表来贺，以幽、蓟、瀛、莫、涿、檀、顺、妣、儒、新、武、云、应、朔、寰、蔚十六州并图籍来献”。至此，燕云诸州交割手续完成。随后契丹更定政区机构，“诏以皇都为上京，府曰临潢，升幽州为南京，南京为东京。改新州为奉圣州，武州为归化州”（《辽史·太宗纪下》，第45页）。

至于“岁输”之起始时间，新旧“五代史”均未记载，《资治通鉴》将其定在天福三年（938年）八月，称“岁输金帛三十万之外，吉凶庆吊，岁时赠遗，玩好珍异，相继于道。乃至应天太后、元帥太子、伟王、南北二王、韩延徽、赵延寿等诸大臣皆有赂”（司马光：《资治通鉴》卷二八一，天福三年八月戊寅，第9188页）。《契丹国志》因袭其说，亦称该年“八月，晋上尊号于辽帝及太后。以同平章事冯道、左仆射刘昫为册礼使，辽帝大悦。晋帝事辽甚谨，奉表称臣，谓辽帝为‘父皇帝’；每辽使至，即于别殿拜受诏敕。每岁输金帛三十万之外，吉凶庆吊，岁时赠遗，相继于道”（叶隆礼：《契丹国志》卷二《太宗嗣圣皇帝纪上》，第21页）。然《资治通鉴》记载契丹史事颇多疏略。如新旧“五代史”、《东都事略·契丹传》、《辽史·太宗纪下》均载耶律德光改元会同，在后晋天福三年，《资治通鉴》则系于“天福二年”，且措辞含糊：“是岁，契丹改元会同，国号大辽。”（司马光：《资治通鉴》卷二八一，第9145页）该书所载天福三年“岁输”也是有疑问的。据《辽史·太宗纪下》记载，会同二年（939年）“八月乙丑，晋遣使贡岁币，奏输戌、亥二岁金帛于燕京”（《辽史》，第46页）。天福三年为戊戌年，四年为己亥年。这次后晋除支付天福四年的“岁输”外，还补交了天福三年的“岁输”。可见，天福三年并未完成“岁输”交接，天福四年才正式开始“岁输”。

二 “岁输”之由来

后唐清泰三年十一月十二日，耶律德光册封石敬瑭为大晋皇帝。《旧五代史·晋高祖纪一》云，“是日，帝言于戎王，愿以雁门已北及幽州之地为戎王寿，仍约岁输帛三十万，戎王许之”（《旧五代史》，第989页）。此处“仍”当做“另”、“又”来解释。后晋既已称臣称子，与契丹有上下尊卑之分，“岁输”实为“纳贡”。《辽史·耶律解里传》论云，“晋因辽之兵而得天下，故兼臣礼而父事之，割地以为寿，输帛以为贡”（《辽史》，第1252页）。然据五代、

宋、辽文献中的相关记载分析，“岁输”名义上是“助军旅之费”。

其一，从数目上看，“岁输帛三十万”，正与契丹所称兵马数相对应。据《辽史·兵卫志中》记载，“大帐皮室军，太宗置，凡三十万骑；属珊军，地皇后（述律氏）置，二十万骑”（《辽史》，第401～402页）。然该书又载，“凡诸宫卫，丁四十万八千，出骑军十万一千”（《辽史·兵卫志中》，第409页）。皮室军、属珊军均为契丹的“御帐亲军”，属于诸宫卫军队，其人数断不可能超过宫卫骑军，故所载数字未必属实。据宋人李攸估计，契丹兵力“未必满三十万”（李攸：《宋朝事实》卷二〇《经略幽燕》，中华书局1985年版，第317页）。不过，“辽国兵制，凡民年十五以上，五十以下，隶兵籍”（《辽史·兵卫志上》，第397页），因而战时动员能力很强。五代时期，契丹南侵用兵多寡不一，然动辄虚称三十万以张其声势。天祐十三年（后梁贞明二年，916年），河东将周德威进攻新州，“契丹主帅众三十万救之”（司马光：《资治通鉴》卷二六九，贞明二年三月，第8814页）。清泰三年九月，辽太宗率军驰救石敬瑭，“契丹主将五万骑，号三十万”（司马光：《资治通鉴》卷二八〇，天福元年九月，第9148页）。后来契丹灭晋，辽太宗欲聚敛财赋北归，对判三司刘昫道：“契丹兵三十万，既平晋国，应有优赐，速宜营办。”（司马光：《资治通鉴》卷二八六，天福十二年正月癸丑，第9335页）可见，后晋“岁输”数额，正与契丹所称军兵人数相对应。

其二，解决契丹军粮草之需要。契丹“行逐水草，军无馈运”（《旧五代史·桑维翰传》，第1165页），进入中原后，粮草成为大问题。史载，契丹“人马不给粮草，日遣打草谷骑四出抄掠以供之”（《辽史·兵卫志上》，第397页。《新五代史·契丹传一》第898页也有类似的记载）。抄掠势必造成局势动荡。契丹灭晋时“打草谷”，造成“东西二千里之间，民被其毒，远近怨嗟”（《新五代史·契丹传一》，第898页），以致“群盗大起”（司马光：《资治通鉴》卷二八六，天福十二年二月辛巳，第9346页）。晋高祖备边有年，熟悉契丹军情。辽太宗北返时，曾留太相温率五千契丹兵追随晋高祖，然攻占洛阳后，晋高祖随即“饒太相温及契丹兵归国”（司马光：《资治通鉴》卷二八〇，天福元年十二月辛酉，第9164页），不愿因契丹兵马骚扰而招致民怨。

其三，对契丹援助之酬谢。晋高祖感念契丹援救，“事之曾无倦意”（司马光：《资治通鉴》卷二八一，天福三年七月辛酉，第9189页）。另外，他本人长期追随唐明宗征战，重视军储之事。后唐长兴二年（931年）进讨东川董璋，即以“川路险艰，粮运不继”而奏请班师。长兴末年，石敬瑭镇守河东后，不断筹集辍重兵饷（《新五代史·契丹传一》，第892页）。清泰三年三月密谋起兵时，“石敬瑭尽收其货之在洛阳及诸道者归晋阳，托言以助军费”（司马光：《资治通鉴》卷二八〇，天福元年三月丙午，第9139页）。起兵反唐后，即以“太原险固之地，积粟甚多”（《旧五代史·晋高祖纪一》，第983页）鼓动河东军将对抗后唐朝廷。契丹

军远道来援,石敬瑭愿提供“助军之费”,亦在情理之中。

又,宋真宗景德元年(1004年)十二月,宋辽订立澶渊之盟。北宋以“风土之宜,助军旅之费”(叶隆礼:《契丹国志》卷二〇《宋真宗誓书》,第189页),每年馈赠契丹“岁币”银十万两、绢二十万匹。契丹在《圣宗皇帝哀册》中则称之为,北宋“贡奉金帛,助贍甲兵”(陈述辑:《全辽文》卷六,中华书局1982年版,第141页)。此可作为后晋“岁输”实为给付契丹“助军旅之费”的又一佐证。

“岁输”以及后来的“岁币”对于契丹有着重要意义。《宋史·郭申锡传》称,契丹“赖岁币甚重”(《宋史》,中华书局1977年版,第10621页)。庆历年间,北宋使臣富弼也告诫辽兴宗:“若通好不绝,岁币尽归人主,群臣何利焉?”(《宋史·富弼传》,第10251页)辽太宗多次劝阻石敬瑭称臣,“更表为书,称‘儿皇帝’,如家人礼”(《新五代史·契丹传一》,第894页),但始终不肯放弃这笔“尽归人主”的“岁输”。

三 后晋“岁输”对两宋“岁币”之影响

“岁输”是晋辽交往的重要内容之一。尽管后晋“所输金帛不过数县租赋,往往托以民困,不能满数”(司马光:《资治通鉴》卷二八一,天福三年八月辛酉,第9189页),但此举对以后中原王朝与北方民族政权的关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。

首先,在中原王朝与北族的交往中增加了岁币。终石敬瑭之世,后晋对契丹“奉之甚谨”,贡输不绝。晋出帝对契丹称孙不称臣,招致契丹南下,终为其所灭。后汉刘知远驱逐契丹军队,与契丹对立。广顺元年(951年)正月,后周建立,周太祖郭威即“命左千牛卫将军朱宪往(契丹)修好”,告以建国之事(王溥:《五代会要》卷二九《契丹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,第461页)。契丹也遣使馈赠良马,“贺即位”。二月,周太祖又遣尚书左丞田敏出使契丹。此后刘知远之弟刘崇割据河东,建立北汉政权。刘崇致书契丹:“本朝沦亡,绍袭帝位,欲循晋室故事,求援北朝。”北汉接受契丹册封,确定为叔侄之国,“约岁输钱十万缗”(司马光:《资治通鉴》卷二九〇,广顺元年四月壬辰,第9460页)。契丹遂竭力扶持北汉与后周对抗。显德六年(959年),周世宗率兵收复瀛、莫二州及瓦桥、益津、淤口三关,这些地区被契丹称做“关南地”、“关南故地”。北宋两次收复燕云失败以后,契丹连年南侵。宋真宗景德元年,契丹以“谋关南之地”而大举南侵。北宋拒绝割地要求,愿以“岁给金帛,助其军费”作为补偿(李焘: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卷五八,景德元年十二月庚辰,中华书局1980年版,第1288页),最终以“岁币”形式订立澶渊之盟,维持旧疆。后来南宋与金朝三次和议,均以“岁贡”、“岁币”为主要内容;南宋在与蒙古及元朝的和谈中,仍然涉及“岁币”之事,不过始终没有达成协议。

其次,后晋“岁输”数额对两宋亦有影响。“岁输帛三十万匹”成为宋人和谈时越不过的界限。澶渊和谈时,宋真宗就“岁币”问题敕令使臣曹利用等人:“百万以

下皆可许也。”宰相寇准则告诫曹利用:“虽有敕,汝所许毋过三十万,过三十万,吾斩汝矣。”(李焘: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卷五八,景德元年十二月丁亥,第1292页)最后北宋是以银、绢三十万两、匹赠予契丹,称做“岁币”。《辽史·圣宗纪五》称,曹利用出使后,“宋遣李继昌请和,以太后为叔母,愿岁输银十万两,绢二十万匹”(《辽史》,第160页)。澶渊之盟后,议者以三十万过多,另一位宰相毕士安回答:“不如此,契丹所顾不重,和事恐不能久。”(《宋史·毕士安传》,第9521页)从数目上看,“岁币”数额与后晋“岁输”数额大体相当。庆历元年(1041年),契丹趁宋夏交战之际索要“关南之地”。宋仁宗做出让步,“别纳金帛之仪,用代赋税之物,每年增绢一十万匹,银一十万两”(李焘: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卷一三七,庆历二年八月乙丑,第3294页)。这样,北宋每年赠予契丹的银、绢总计五十万两、匹。不过,其中新增绢、银是作为关南县邑代税之物,称做“纳”,故后来人们屡屡提及的仅是后晋“岁输帛三十万”之事。

宋辽“岁币”数额直接影响宋金和谈。宣和二年(1120年)三月,宋使赵良嗣渡海与金朝会商攻辽,答应将原输之与辽的“岁币”银、绢三十万转让给金朝,金朝抱怨:“契丹时燕京不属南朝,犹自与五十万。如今与了燕京,如何只三十万?”(徐梦莘:《三朝北盟会编》卷四《政宣上帙四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,第25页)经过反复辩论,最后北宋允诺将给契丹的银、绢五十万两、匹转给金朝。天会二年(1124年),金太宗即“征岁币于宋”,其中“银二十万两、绢三十万匹”(《金史·宗望传》,中华书局1975年版,第1074页)。南宋与金朝三次和议,除确定双方地位、划定疆界外,其“岁币”也是参照宋辽和议而不断调整的。绍兴和议规定,南宋“许岁币银、绢(各)二十五万两、匹”(《金史·熙宗纪》,第78页);隆庆和议中,“岁币减十万之数”(《宋史·孝宗纪一》,第630页),“约岁币(银、绢各)二十万两、匹”(《金史·纥石烈志宁传》,第1933页);嘉定和议又做调整,“增岁币为(银、绢各)三十万两、匹”(《金史·完颜匡传》,第2169页)。

宋金“岁币”数额又影响到宋蒙(元)谈判。南宋绍定三年(1230年),蒙古使臣王檝使宋,商谈伐金之事,“复求岁币银、绢各二十万”(《宋史·李宗勉传》,第12237页),显然是参照了隆兴和议的数额。德祐元年(1275年)十二月,元军迫近临安,南宋遣使“请尊世祖为伯父,而世修子侄之礼,且约岁币银二十五万两,帛二十五万匹”(《元史·伯颜传》,中华书局1976年版,第3108页)。此事虽遭拒绝,但岁币银、帛数额显然是宋方参照绍兴和议提出的。由此看来,后晋“岁输”之影响不可谓不深。

收稿日期 2010—04—20

作者张金铤,历史学博士,安徽大学历史系教授。安徽,合肥,230039。

【责任编辑 惟正】